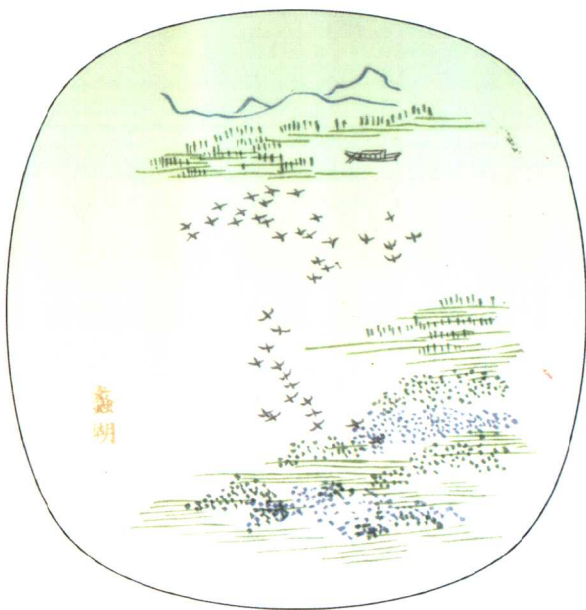


丁伟志

无树有巢

建筑材料是「书」，规模确定为「小」，形象则类乎鸟儿搭在树上的「巢」。



蘇明

成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树有巢/丁伟志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书趣文丛;第五辑)

ISBN 7-5382-5014-X

I. 无… II. 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613 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7 千字 印张:7¼ 插页:2

印数:1-6 0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俞晓群

技术编辑:华 德

装帧设计:张 红

美术编辑:谭成荫

特邀校对:赵福增

责任校对:马 慧

定价:11.00 元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园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

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更易为人接受。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我辈大可就此退隐，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必然有所予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以中国之大，“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讲到这里，似乎还可交待一句：《书趣文丛》产生的原委之一，其实就在补苴罅漏。人们误传它是同类丛书的始作俑者。大误。在它之前，已有有关的著名丛书。只是一时之间，有关的丛书容纳不了如许选题，不能不压缩范围。一时斫下十来个题目，而编辑手边已经有稿，又正好在有的刊物中出现了读书有趣或无趣的讨论，于是只能“分流”。“分流”也者，其实也可叫“嫁祸”，因为所以斫下选题，只是为了害怕亏本（当时也确实亏不起）。将不肖的“赔钱货”远嫁关外，配流他乡，隔不多时，流外之物居然成材，而且蒙名流大家赏识，得以持续出版至第五辑，实为始料未及。然而归根结柢，还得感念关内关外的诸多公婆，耐心帮助抚育。编撰中国出版史的衮衮诸公，大可以此事为中国出版“全国一盘棋”以至兴旺发达的一个注脚。一笑！

脉望

1997年10月

1	致读者
3	乱翻书记
5	重筑小书巢
13	赏心乐事乱翻书
21	识字·断句·念书
34	往年也曾论读书
49	潮起潮落
51	“位卑言高”之议
76	“康学”三源
99	解读《翼教丛编》
118	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
140	晚清国粹主义述论
158	从国难中觉醒
167	“用新式机器开发矿藏”
171	临风寻觅
173	寻觅历史感
178	且从大处说“方法”
185	历史学有什么用？
191	垦拓与收益
195	“未定”与“已定”
199	从动态上看儒学
201	弄潮自应到潮头
205	初唐文化的气象
210	重读《再思集》怀澍公

致读者

本集是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六年间所写文章中选出的，大大小小，计二十篇。

选的标准是什么，说不清楚。什么样的文章不选，心里倒有本豆腐帐。第一，报告、讲演之类，不选；第二，政论、时评之类，不选；第三，思辨性太强的学术文章，不选。属于第三类的部分文章，已另编一本集子，在付印中。

筛选之后，乃成此集。文章的种类、风格很杂乱，只好勉强分做三组：一组算是读书随笔，不过“随”是“随”了，学术味却不多。一组是学术论文模样的读书笔记，或者叫读书笔记式的学术论文。还有一组只好叫做学术杂感，偶发的小议论、序文、纪念性文章等，均归此组；大体上这是属于探讨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的。

这二十篇文章中，发表过的有十五篇，未发表过的有五篇。已发表的文章，这次收入本集时，根据《丛书》的性质，稍微做了一些删削或增补，也有局部的改写。但是这些损益，都是小手术，且以有益而无害于主体为准，犹如给果树

剪枝施肥。原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则一仍旧贯。

至于这些文章，能否引起读者的雅趣或俗趣，则不得而知了。如果只是作者自己觉得有趣，就像相声演员只是说得自己哈哈大笑那样，可就很对不住读者了。谨此预先告罪。

作者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于京西小书巢

乱 翻 书 记

重筑小书巢

我有一位大我将近三十岁的老表哥，就是当年用楷书誊正《中苏友好条约》中文本的陈秉忱同志。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几年间，他已经无官一身轻，有了空暇在家以书画自娱。看他清闲，我也就常常登门造访，随便聊天。他出身在书香世家，是清代著名金石大家陈介祺的后人。家学渊源，造就了秉忱先生高品位的文化素养，于文章、书画、金石、篆刻，无不有独到处。叨姻亲的光，他主动给我治了两方印，写了一幅横幅。横幅，确切些说，当算斋额。上书大字三个：“小书巢”；字后并有短跋，说明“小书巢”是先父稼民公当年在家乡读书著述的书斋。我把这幅字裱好，挂在了我的书房兼客厅的墙上，很得意过一阵子。

小书巢这名字，小时候是听到过的，可是少小离家，几十年间已与书房无缘，把它也就淡忘了。老表哥的题字，也许旨在唤起我的一种自觉，趁着尚未老朽赶快下投身学术的决心，不过他从未正面说起这重意思。不久，秉忱先生去世了，我便把他写的斋额摘下来，珍而藏之。这时候，在京郊寓所里营造一间小小书巢的心愿，却萌动起来。于是厚着脸皮，东施效颦，自己动手，写了叉手叉脚的“小书巢”三个字，悬挂壁上，连是否惹人讥嘲为附庸风雅也在所不计了。当然这个小书巢，和八十年前父亲的小书巢，规模、内容与旨趣，都已大不相同，其差异真个是“划时

代”的。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那个老“小书巢”的年代，只是从老人的回忆和家存断笺残篇中，得知一些有关它的旧事。父亲辟建小书巢，大约是民国初年的事。少年时他受业乡贤韩善甫先生于十笏园西侧深柳读书堂，稍长除进新式学堂就学外，仍从韩先生攻读文史于祖传藏书处“砚香楼”下，成年而具独立治学能力后，乃另辟一室，作为与同人研究著述处所，并命名为“小书巢”。八十年代初，我因公路过故乡时，曾去看过这个书斋的旧址。屋舍完好，即在“十笏园”后西跨院内，那时檐下还挂有新作的“小书巢”匾，是故乡著名书法家高小岩先生手书。九十年代，又路过重访，该处已改作“郑板桥纪念馆”了。我对于这一作法，由衷赞赏，觉得那个旧书斋，这一回真是得其所用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十笏园及小书巢，战争年代一向是被日伪和国民党的军队、官僚们霸作署衙的。我们建国后，也没有派作文化用场。如今决策者明识，用旧日书斋，来纪念于我的故乡有着重要文化遗泽的郑板桥，怎能不令人鼓舞雀跃。而且，我虽然不能确知“小书巢”名称的来源，但是总以为它多半是从郑老先生题写的“小书斋”匾额脱化出来的。八十年代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印的《板桥书画拓片集》，第一幅即“小书斋”，似乎可作证据。或许这种推断纯属望文生义，但是我对此想颇为得意；尤其沾沾自喜的是，觉得先人敢于将“斋”改作“巢”，还是颇有眼力的。一字之变，意味无穷。

事后知道，父亲当年在小书巢里的成果颇多，不但编辑了《小书巢丛书》，还有一些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的论著，并有历史教材、乡土教材出版。和国内学术界的交往，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可惜十余年后，因家道中衰，兄弟分爨，我家搬到故宅东

侧，“小书巢”也从而寿终正寝。父亲的书和书斋倒都还有，不过书斋的名字改成了“习庵”。这“习庵”，是名副其实的麦秸作顶的一座草庐，不过后边还有廊房相连的两进藏书的书屋，且前院有腊梅，后院有海棠，繁花满树时，那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儿时过暑假，我常常随着启蒙老师杨质斋先生，在习庵里静静地读书习字。可以说，这个幼年的读书处，还算是给我粗浅的文化知识打下几块破碎的可怜巴巴的基石的地方。可是，自打多少懂事时起，我就不大喜欢“习庵”这个名字，觉得这个“习庵”可远不如那个“小书巢”响亮和高雅了；更不必说匾上那个“庵”字，写作“今”字下面加“酉”字，“酉”字下面又加“皿”字，且被书法家写成古色古香的籀文，简直令人望之生畏。习庵留给我最为温馨的童年回忆是，由于父亲肯于变卖分到手的产业去购置图书，所以习庵中的藏书日渐多起来。那时候究竟收有多少万册，我这样的幼稚顽童弄不清楚，只记得到了“七七”之前，前后三进房舍中，已是书报盈橱盈架，二三小友已可当做八卦阵，摸打滚爬于其间了。后来知道，父亲的研究工作，在习庵这几年里，倒是又有了较大的开拓。至于对我来说，值得留恋的是，习庵的藏书，毕竟成为我少年时期获得精神食粮的宝藏。从读小学三四年级起，我便从书库中找出大量书籍阅读，从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名著到“五四”以来新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从引人入胜的“福尔摩斯”，到读不懂又放不下的“托尔斯泰”，一概贪得无厌而又生吞活剥地读下去。受惠于此的地方，自不必说；消极后果却也颇为可观：一是学校里的正课，一度荒疏得一塌糊涂；二是落得终身相伴深度近视眼镜。

时代大局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家庭中小小书房。小具规模的我家的藏书，也不能不再经沧桑。四十年代初，举家寓居北京

小红罗厂禹贡学会旧址，熬着《四世同堂》里的那种日月时，父亲为避免战火为虐，把藏书或部分精品分批运到北京，并经老友张星娘先生手，暂存于辅仁大学。父亲旋即病逝客寓。直到一九四九年初北京解放时，已是四野一名战士的我的四姐重新回到北京，才把父亲的这部分遗书，全部捐献给解放军军方的一所研究机构。而在这以前，家乡早已解放，家中所存的大部分藏书，已由我的三姐经手，全部捐献给了当地公家图书馆。父亲在世时已立志创造条件，在已有藏书的基础上，建立一所为公众使用的图书馆，我们姐弟总算在新的时代里完成了他的遗愿。况且其时我们已是抱着“投笔从戎”的满腔激情，一心要投身到革命战火中去创造新世界；和书山学海告别，简直觉得有些像是如释重负的一大快事。那时候我像许多行将成年的大孩子一样，自我感觉绝对良好，捐了藏书，打起背包，告别家庭，踏上征程，真有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往无前的使命感。如此心态，自然顾不上编制个人的未来的梦，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材料，不过有一点却是不含糊的，这就是那时候压根儿没想到老来还会重又生出一片痴心，甘愿吃力不讨好地去再建书巢，再进书巢，逆商品经济大潮而动，硬着头皮想挤进书呆子的行列里去。

人生的机遇，是用不到得意洋洋，或者怨天尤人的。谁也没有能耐挑选自己生活的时代，太平也罢，战争也罢，碰上哪段算哪段。就目睹和亲身参与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言，我们这一代欣逢其会，实在是极大的幸运；但是，就做学问而言，或者准确些说，就按照老式的“读书破万卷”的做学问标准而言，我们这一代可不免有点生不逢时。透过读书人偏执的眼睛看，我长期生活的青少年年代，正是不适宜于作学问的时期。出生那年，赶得也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此后，依次经

历的是战争为主的年代，运动为主的年代，然后才迎来建设为主的年代。

我在这里不顾修辞学，在某某与年代之间别别扭扭地加上“为主的”字样，目的无非是借以避免绝对化错误罢了。也就是说，当年在战争、运动之外，还是干过许多别的事的，就像现今在经济建设之外还干许多别的事一样。拿读书一事来说，在战火纷飞之时，运动频仍之际，也还是总有些人、特别是儿童和少年，可以读些书的。何况战争或运动，总还有间歇的时候，总还有扫帚扫不到的角落。我也算幸运儿，在这期间认真读过三四年书，特别是认真读过让我终身受用无穷的大量的马列主义的书；业余也还读过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记得一九五九年秋冬间，我还秉胡绳同志命，写过一篇题目叫做《认真地多读些书》的评论，发表在《红旗》上，而那正是提倡“不读书就可以写书”的风头正劲的时节。可见，说在那样的年代里完全不能读书，或者完全不许读书，倒也是过甚其词。问题只是，在那样热火朝天的氛围中，要想把书读多读好，把学问做深做细，则确乎是不大有可能的。有的同年老友感慨系之，说：我们这一代是出不了大学问家的！环顾今日域中，信然。历史的命运是无法抗拒的。我们的父辈有一批大学问家涌现，我们的儿子一代也有出一批大学问家的希望，而我们这一代看来只好发挥知识分子的另一优长：起“桥梁作用”。

国家进入了建设为主的时期，对于想读书做学问的人来说，按说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佳时机。叫我们这代人略感遗憾的是，好时候到了，可我们自己却已年过半百，行将老矣。圣人是十五而志于学，我们这些凡夫是五十而志于学，“时差”恐怕难以“倒”过来了。天可怜见，我在五十出头的时候，在秉忱表哥题字

的启发下，终于唤起了重筑小书巢的“野心”；至于凑成几架杂七杂八的书刊，安坐其中，“躲进小巢成一统”，有了进入书斋主人角色的感觉时，可已年届花甲。这把年纪，再下读书的决心，不能不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人们都非常熟悉的孔老夫子那段治学自述的话当中，最难懂的大半就数“六十而耳顺”这一句了。“耳顺”是何等境界？为什么把它摆在“知天命”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间这样的高层次上？有人戏解道：这无非是说，涵养已高，好话坏话都能听得进而已。有人说，不对。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情世故，老练圆通，不管人们说什么，无不一听即懂。又有人说，还是解得不对。此话本意，乃是说人已老迈，耳朵聋了，管你说什么，我概做洗耳恭听状，事实上却是充耳不闻，耳根清静，得以我行我素也；不然的话，何以下一步便能修养到“从心所欲”的境地。且不管他“耳顺”是否可以歪解作“耳聋”，但我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去做“志于学”的践履时，确实感到耳已不聪目已不明，所以在六十岁打油自嘲中有句曰：“学未通兮耳未聪”。这时候再立志读书，实乃自不量力，不知好歹。有次偶遇许久不见的一位朋友，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不经意地答道，看看书，还想写写书。他大不以为然地当即评论说：何苦来哉！要我，退了休，就什么书也不看，优哉游哉，岂不快哉！我无言以对。

其实，到老了，却要与书相伴，用书筑个此后安身的小巢，并非还敢妄生什么鸿鹄之志。做点有益于世的事，这样的心思，虽不好说一点也没有，可是，绝对没有存什么做大学问的痴心。趴在厩中的老马，偏要一脑袋“千里之志”，岂非自寻苦恼。说穿了，老来反而迷恋于书，根本的动力，则是恰如《书趣文丛》的名字所示：“趣而已矣！”钻到书堆里去，是为着自得其乐，而不是为

着自讨苦吃，这当是所有读书人都该明白的人生哲理。“学海无涯苦作舟”那句话，实在有叫人讨厌的一面。提倡“勤”还有理，不加限制地提倡“苦”那就不免有些煞风景。高标准的学习成绩，固不免总是要付出辛苦的，但是也不能把“苦”看做是从学的唯一应具的精神状态吧。读书而无趣味，不但不快乐，反而觉得苦不堪言，能学好吗？小时候听到“头悬梁，锥刺骨”的典范，实在心惊胆战，觉得认真读书原来是要受如此酷刑，不免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那样的读书法恐惧和抗拒心理。窃以为，时下中小学教育中，好像就是有点沾上了迷信“苦作舟”的毛病。其实，“苦作舟”的学习方法，是连两千年前孔夫子的教育思想都不及的。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学习的特点就是“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所以孔老夫子才大加称赞：“贤哉回也！”

更消极些说，老来读书能否使自己发挥“余热”姑且不论，起码可以从书中为自己找些“余温”，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专心致志，闭门读书，不为物扰，不为事忧，岂不给家人给社会减少了许多麻烦。况且，读书只要得法，还可以收陶冶性情、排除烦扰、调节心理、健脑强身的功效，大有益于益寿延年。据报载，匈牙利对于读书可以治病，早已有科学研究的成果问世，可见读书绝非注定是苦差事的论断，的确是一条中外都认可的公理。如此看来，视个人情况选择一些适宜的读物，以愉晚岁，也无疑是一种上佳的养老方案。

老来读书，精力渐衰，效率渐低，读书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读书的分量越来越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人之常情。那就以宽松的心情待之，顺其自然去罢。不管将来必定会有读不动书的一天到来，且抓住能读得动书的有生之年，享受读书的乐趣，岂

不是非常合算的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到只剩下对书的“一片爱心”而没有读的力气时，那可悔之晚矣。至于说到做学问，那只好量力而为了。随着年齿日增，学问越做越小，以至于“堕落”到光读书不做学问的地步，也是逃不脱的人生之路，无须哀愁。不过，话说回来，什么算做学问，也难立种严格的标准。曾听钱钟书先生戏言：做学问有什么难的，无非是把书架上的书拿来抄到自己的书里，然后再把自己的书摆到书架上去罢了。^①如此说来，纵然年迈，只要还有举手之劳的力气，不大像样的学问，也还是可以对付着做一些的。陈白沙向往的：“他年倘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也不见得是多么优雅而快乐的境界。

当然，要读书读的惬意，还得为此创造一点起码的条件。最起码得具备必要的书和放得下一条冷板凳的地方。当年我看到秉忱表哥题赠的“小书巢”字幅时，之所以怦然心动，暗下决心搭巢，盖由于此。喜欢这名称，倒也不是出自恋旧的情结，而是觉得颇合时下自己的条件。建筑材料是“书”，规模确定为“小”，形象则类乎鸟儿搭在树上的“巢”。看看现在自己在高层楼上胡乱拼凑起的书房，真觉得这名称的意境实在妙极了。小时候读《鲁宾孙家庭漂流记》，对于几个孩子在树上搭巢而居，羡慕得不得了。高则高矣，小则小矣，但总比教科书里说的我们的老祖宗“穴居野处”风光得多了。安居于用书搭成的小巢里，绝对会比住进帝王的皇家宫殿或者神仙的洞天福地，都舒心多多。

一九九六年七月

① 这是当年闲谈中听钱先生所说。先生在文章中亦曾涉及此义，不过寓意却在别处。如《宋诗选注·序》中有云：“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得像个写学位论文的未来硕士博士，‘抄书当作诗’，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